

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残本七种*

杨洪升

文澜阁《四库全书》因遭太平天国战乱而散佚,乡绅丁丙、丁申兄弟掇拾丛残,收回八千餘册,其余四分之三或被毁,或流入他人之手,经过百餘年递传,一些原写本的散卷零本今散见于各地图书馆。据笔者所知,天津图书馆藏有元魏初《青崖集》残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宋陈渊《默堂集》残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明练子宁《中丞集》二卷。笔者近于南开大学图书馆见所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七种,未为人悉。现略加考述,以便学界识其特有之文献价值。

一、七种残本之特征

南开大学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写本《四库全书》残本七种,八册,包括:宋寇準《忠愍集》卷上,一册;宋周孚《蠹斋铅刀编》卷六至十二,一册,卷十三至十八,一册,凡十三卷;宋韩洵《涧泉集》卷五、卷六,一册;元王恽《秋涧集》卷五十八至六十,一册;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二、卷二十三,一册;明释妙声《东皋录》卷上,一册;清汪由敦《松泉集》文集卷十六至十八,一册。七种残本形制并同,均系坚致太史连纸,红格,框高 20.8 厘米,宽 14 厘米。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书“钦定四库全书”,鱼尾下双行小字记书名、卷数。各卷首行均顶格书“钦定四库全书”,次行低一格书书名、卷数,第三行下书作者及其朝代。各册均楷书甚工,然七种残本字迹不同,显然出于不同写手。每册首叶均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末叶上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大方印。又《忠愍集》、《涧泉集》、《滋溪文稿》、《秋涧集》四种残本卷末左下角钤“蟬隐庐秘籍印”朱文方印,印色与“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不同,显系后来所钤。

七种残本均已经由原来的包背装改装为普通线装。每册卷后副叶均墨笔行书题有总校官与校对者官职姓名:《忠愍集》卷后副叶下首行书“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次行较首行低三格书“检讨臣徐鉴”,三行书“校对生员臣胡纪

* 本论文系南开大学 2007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青年项目成果,项目号 NKQ07001。

勋”；《蠹斋铅刀编》卷十二、卷十八后副叶下皆首行书“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次行低三格书“编修臣胡荣”，三行书“校对监生臣谢扬镇”；《润泉集》卷六后副叶下首行书“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次行低三格书“检讨臣徐鉴”，三行书“校对生员臣胡纪勋”；《秋涧集》卷后副叶首行书“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次行低三格书“编修臣胡荣”，三行书“校对生员臣胡纪勋”；《滋溪文稿》卷二十三后副叶书“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编修臣胡荣”，“校对生员臣何天衢”三行；《东臯录》卷后副叶下首行书“总校官编修臣吴裕德”，次行低三格书“编修臣胡荣”，三行书“校对监生臣戴凤苞”，“戴凤苞”三字有挖改痕迹；《松泉集》卷十八后副叶下首行书“总校官检讨臣彭元琬”，次行低三格书“编修臣胡荣”，三行书“校对生员臣何天衢”。

七种残本中，《忠愍集》卷前副叶黏有黄签：“详校官内阁中书臣吕光复”；《蠹斋铅刀编》卷六、卷十三前副叶各黏有黄签：“详校官刑部主事臣杨梦符”；《秋涧集》卷五十八前副叶黏有黄签：“详校官吏部主事臣薛淇”；《滋溪文稿》书首副叶有黄签：“详校官检讨臣邓再馨”；《东臯录》卷前副叶黏有黄签“□□□□□主事臣王奉曾”，前数字已残失。而《润泉集》、《松泉集》卷前副叶所黏黄签盖已失去。

二、文澜阁写本之确认

上述七种残本的各种特徵，符合清乾隆间馆臣编纂的《四库全书》的特徵，应当是《四库全书》流失在外的残本。每种残本各册卷前、卷末的详校官、总校官及校对人员均是四库馆中人，多诸《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及《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任事诸臣衔名。若吴裕德，《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屡载之，其在办理北四阁《全书》时为武英殿提调，《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乾隆四十七年（1782）七月开列任事诸臣衔名载其名，办理江南三阁时任提调官并兼司总校官之职^①。其系顺天府大兴县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甲二十四名进士。彭元琬，《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任事诸臣衔名载其人，任武英殿提调官。其系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甲二十七名进士，江西南昌府南昌县人，办理《四库全书》副总裁彭元瑞之弟。办理南三阁时已兼任总校事。《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彭元琬与吴裕德不下百数十次，两人居四库馆甚久，用力甚多，亦均屡受赏罚。胡荣，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开列任事诸臣衔名载其人，任缮书处分校官，

^①《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谕内阁将〈诸史同异录〉从〈全书〉内掣出销毁并将总纂等交部议处》内有云：“其承办续三分书之侍读恭泰、编修吴裕德虽系提调兼司总校，但率任书手误写，均难辞咎。所有办《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孙士毅、陆锡熊，总校陆费墀、恭泰、吴裕德，从前覆校许烺，俱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92页。

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其亦曾任《四库全书荟要》总校官^①。乾隆四十七年议续办南三阁《全书》，永瑆曾奏请其与徐鉴等八人充提调^②。其系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乾隆四十年二甲四十名进士。徐鉴，续办南三阁《四库》时曾充提调，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三十日《质郡王永瑆等奏查明四库全书遗失有印底本请将提调等分别议处折》奏其遗失有印底本十二种^③。徐氏系乾隆四十五年三甲二十二名进士，汉军镶黄旗人。薛淇在四库馆任职甚久，办理文渊、文源两阁书时即已任详校官^④。其系江苏江阴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甲十五名进士。吕光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载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质郡王永瑆等奏现办覆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折》所附覆校诸人名单有其人^⑤；同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文渊文源阁详校各员等拟赏缎匹名单进呈片》所附拟赏详校四库全书各员名单中有其名，其时以内阁中书任详校官。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南巡，召试江南诸生，有吕光复被钦取为一等举人，授予内阁中书^⑥，即此人。邓再馨，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质郡王永瑆等奏现办覆校文渊文源两阁书籍事宜折》所附覆校诸人名单载其人；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文渊文源阁详校各员等拟赏缎匹名单进呈片》附拟赏详校《四库全书》各员名单有其人；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吏部为知照原校文源阁全书人员罚俸事致典籍厅移会》附载罚俸诸人载其人^⑦。各处均载其任翰林院检讨。邓氏贵州南笼府普安州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甲四十九名进士，曾与徐鉴同任乾隆五十四年（1789）湖南乡试考官。王奉曾，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文渊文源阁详校各员等拟赏缎匹名单进呈片》附拟赏详校《四库全书》各员名单有其人，系六部司官之一。王氏系顺天宛平人，乾隆四十九年二甲十九名进士，《清秘述闻》载其曾任

①《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荟要处汇核七至九月缮写讹错奉旨记过之总裁等清单》内有云：“《唐摭言》内，‘惟仆尚存’句，‘惟’讹‘唯’。总校官胡荣、分校官曹锡龄各记过一次。”第1114页。

②《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户部为再行酌定续办四库全书事致稽查房移会》所附《永瑆奏为续办四库全书三分事宜请旨折》，第1702页。

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55页。

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文渊文源阁详校各员等拟赏缎匹名单进呈片》所附拟赏详校《四库全书》各员名单中“六部司官”部分首位即薛淇，第2070页。

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14页。

⑥高晋等编：《钦定南巡盛典》卷七四载：“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谕内阁曰：江苏、安徽进献诗册诸生，其考取一等之举人汪履基着授为内阁中书，遇缺即补，吕光复、洪梧、赵怀玉、杨掇、董教增、朱文翰、盛惇大、言朝标、金廷欣、江澍俱着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290页。

乾隆五十四年顺天府乡试同考官,称“刑部主事王奉曾字序思”^①,其在六部所司之官当即刑部主事,黄签残失数字当即“详校官刑部”。胡纪勋、谢扬镇、戴凤苞、何天衢,均见诸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质郡王永琿等奏请钦赐三分书校对贡生陈煦等举人并准予会试折》,他们系乾隆四十九年办理南三阁书时自备斧资入四库馆任校对之人,当时共选取二十四名,戴系贡生,胡、何系生员,谢系监生,待永琿奏请此折时,戴凤苞业已去世^②。

《四库全书》凡钞七部,七部外形有明显不同,从用纸上说,这七部《全书》全是用红格纸抄写,纸八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版心上书“钦定四库全书”。但北四阁与南三阁所用纸质地与开本大小并不同。北四阁用开化榜纸,南三阁用坚致之太史连^③。北四阁开本略大,南三阁开本相对较小。举例而言,文渊阁版框高 22.3 厘米,宽 15.3 厘米;文溯阁版框高 22.5 厘米,宽 15.5 厘米;文津阁版框高 22.3 厘米,宽 15.1 厘米;而南三阁中的文澜阁板框高 20.8 厘米,宽 14.0 厘米。此七种残本框高 20.8 厘米,宽 14 厘米,较北四阁诸本开本略小。此外,七种残本卷末副叶总校官名题吴裕德、彭元琬亦曾任提调南三阁时兼司总校之职。胡纪勋、谢扬镇、戴凤苞、何天衢亦是办南三阁时才入四库馆的专职校对之人。

此七种残本钤印与北四阁《全书》钤印全然不同。文渊阁本每册首页钤“文渊阁宝”,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文源阁本首页钤“文源阁宝”和“古稀天子”,末页钤“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文津阁本首页钤“文津阁宝”,末页钤“避暑山庄”和“太上皇帝之宝”;文溯阁本首页钤“文溯阁宝”,末页钤“乾隆御览之宝”。北四阁均钤各阁阁宝。南三阁《全书》各册首页不钤阁宝,仅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末页上钤“乾隆御览之宝”。此七种残本所用之印正是南三阁的特征。

江南三阁《全书》,文宗阁、文汇阁本于咸丰间遭太平天国战乱被焚。战乱之后,莫友芝曾奉命查访二阁之书,嗣后莫氏上书称:“奉钧委采访镇江、扬州

①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1982年,第509页。

②《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987页。

③《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载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多罗质郡王永琿等奏遵旨酌定雇觅书手缮写全书章程折》云:“现办《四库全书》,俱用金线榜纸,若添写三分,仍照前项纸色,恐致牵混,且恭绎谕旨,此书分贮各处,许多士编摩誉录,在于广布流传,与天府珍藏,稍有不同,拟用坚白太史连纸刷印红格,分给缮写,以示区别。”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乾隆皇帝批:“依议。钦此。”第1613页。又载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户部为再行酌定续办四库全书事致稽查房移会》所附《永琿奏为续办四库全书三分事宜请旨折》云:“伏查原奏写书格纸,改用坚白太史连,系欲与先办四分显有分别,以免牵混。今由户部取到太史连纸样,质地尚属坚致,惟尺幅较小,臣等按将板心略为收入,将来四面裁齐,装钉成书,较之先办之四分,其高矮阔狭所差不过七八分,似亦不甚悬殊。谨将原用式样及拟改式样分别粘签,恭候钦定。”乾隆皇帝批复:“依议。钦此。”第1702页。

两阁四库书,即留两郡间二十许日,悉心咨问……咸丰二三年间,毛贼且至扬州,绅士曾呈请运使刘良驹筹费,移书深山中,坚不肯应。比贼火及阁,尚扃坚固,竟不能夺出一册。镇江阁在金山,僧闻贼将至,亟督僧众移运佛藏避之五峰下院,而典守书阁者扬州绅士,僧不得与闻,故亦听付贼炬,惟有浩叹。”^①是两部《全书》已化为灰烬。尽管莫氏下文又云金长福称文汇阁本“借录未归与拾诸煨烬者,尚不无百一之存”云云,然百馀年来并未见一本残册公布于世,是其靡有孑遗。今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文宗阁四库全书装函清册》,但其无栏线、无版心,更无“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等印记,其与内府抄书惯例不合,更没有江南三阁《四库》本的任何特征,其是否系文宗阁中物,大有疑问。此外,亦未有任何文宗阁本传世。江南三阁书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只有文澜阁本,此七种残本与笔者目验的现存文澜阁《四库全书》形制、用纸、钤印等完全相同,它们应当是流失在外的文澜阁残本。

民国元年(1912),钱恂任浙江图书馆总理(馆长),编有一部《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记录了当时浙图所藏文澜阁《四库》原写本及丁氏兄弟补抄本的有关情况。该目卷四载有此七种集子存佚情况:“《寇忠愍诗集》三卷,二册。补抄。”“《蠹斋铅刀编》三十二卷,五册。补钞。”“《涧泉集》二十卷,存五册。旧抄存卷三、四,卷十一、二,卷十五至末,馀缺。见丁氏《待访目》。”“《秋涧集》一百卷,四十册,计补钞者二十册。旧抄存卷一至三,卷十六至四十,卷五十一至五十三,卷六十七至六十九,卷七十三至八十二,卷八十六至八十八。”“《滋溪文稿》三十卷,十四册。计补钞十一册,旧钞存卷六、七,卷十、十一,卷二十、二十一。”“《东皋录》三卷,三册,计补钞者二册。旧钞存卷中。”“《松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六卷,十八册,计补钞者十四册。旧钞存卷二至四,卷九至十二,卷十九、二十。”^②钱氏所称“补钞”指丁丙兄弟因原写本散亡而补钞之本,“旧钞”指文澜阁原写本。据此可知此七种集子当时浙江图书馆或全散亡或仅存残本,而南开大学图书馆所存之残本各卷浙图均无原写本,可推知它们系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散佚之书,而后来未被丁氏兄弟收回者。

在钱恂编写《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之后的数十年里,浙江图书馆又进行了一些补钞和搜访工作,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编有《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载今浙江图书馆所藏文澜阁《四库》的版本情况,分别记此七种集子云:“《寇忠愍公诗集》三卷,丁抄”^③;“《蠹斋铅刀编》三十二卷,丁抄”^④;“《涧

①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中华书局,1982年,第20页。

②钱恂:《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卷四,民国十二年(1923)浙江公立图书馆刻本。

③《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三,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47页。

④《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三,第951页。

泉集》二十卷,原抄存卷三、四、十一、十二,卷十五至二十,补张抄”^①;“《秋涧集》一百卷,原抄存卷一至三、七、八、十六至四十、五十一至五十三、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七至六十九、七十三至八十二、八十六至八十八,补丁抄”^②;“《滋溪文稿》三十卷,原抄卷六至十一、二十一、二十二,补丁抄”^③;“《东皋录》三卷,原抄卷中,补丁抄”^④;“《松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十六卷,原抄卷二至四、九至十二、十九、二十,补丁抄”^⑤。据此,知民国之后虽然文澜阁原本搜得多卷原写本,此七种残本仍在散亡之列,益可推知它们当系文澜阁原写本。据《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这七种残本中浙图藏有其他卷残本的有《涧泉集》、《秋涧集》、《滋溪文稿》、《东皋录》、《松泉文集》五种。浙图古籍部徐晓军先生、张群先生代为检阅各残本,其各种每册卷前黄签详校官、卷末副叶总校官、校对生员与南开大学藏残本正同,就连《东皋集》卷末副叶下第三行所书之“校对监生臣戴凤苞”,“戴凤苞”三字有挖改痕迹也完全相同。上文已言及戴凤苞系以贡生自备斧资入四库馆任校对,此处将他人挖改为戴氏,而前面的“监生”二字并未能挖为“贡生”,两残本挖改相同,为它们同系文澜阁写本之明证。亦进一步证明了七种残本确同系文澜阁本。

七种残本中,《忠愍集》、《涧泉集》、《滋溪文稿》、《秋涧集》四种残本卷末左下角钤“蟬隱庐秘籍印”朱文方印,“蟬隱庐秘籍印”是罗振常的藏书印,振常系罗振玉从弟,民国间曾于上海设书肆三十年,这些残本盖其此时所得。今香港中文大学所藏文澜阁《四库》写本《中丞集》也钤有罗氏藏书印,其当时所得文澜阁原写本当有多种,后又流散。

文澜阁《四库》写本原系包背装,陆光祺曾述其装治云:“经部用葵绿绢面,史部红绢面,子部月白绢面,集部灰绢面……每册底面绢裹黏钉,不压线。”^⑥今浙图所藏原写本经丁丙兄弟收回者,多被丁氏改为普通线装,盖其无力将原写损毁之本、收回前业经他人改装之本及补钞本与原装本装订一致,遂改装原本以昭划一。此七种残本已改为普通线装,书衣也被撤换为普通书衣纸,盖系书估所为。

三、特殊之文献价值

作为文澜阁《四库》原写本,此七种残本的文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它们还有特殊的文献价值。今分别将其与文澜阁《四库》本相校,可见一斑。

①《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三,第952页。

②《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三,第954页。

③《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三,第955页。

④《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三,第956页。

⑤《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附录三,第961页。

⑥孙树礼、孙峻:《文澜阁志》卷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钱塘丁氏嘉惠堂刻本。

1.《忠愍集》

与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忠愍集》相校,多有不同。文渊阁本卷首有乾隆《御制题字李若水忠愍集》一诗并题识语,文渊阁残本无。李若水曾从宋钦宗入金营,以忠节名,集亦名《忠愍集》,久散佚,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乾隆皇帝撰诗大力表彰,办理文渊阁书之馆臣置之寇準《忠愍集》卷首,盖系偶误。

残本卷首有提要云:

臣等谨案,《忠愍诗集》三卷,宋寇準撰。準事迹具《宋史》本传。初准知巴东县时,自择其诗百余篇为《巴东集》。后河阳守范雍哀合所作二百余篇,编为此集。考《石林诗话》有《过襄州留题驿亭诗》一首,《侍儿小名录·拾遗》有《和蒨桃》诗一首,《合璧事类前集》有《春恨》一首、《春昼》一首,皆集中所无。盖《题驿亭》、《和蒨桃》二篇语皆浅率,《春昼》、《春恨》二首格意颇卑,雍殆有所持择,特为删汰,非遗漏也。準以风节著于时。其诗乃含思凄惋,绰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也。惟《湘山野录》尝称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二句,以为深入唐格,则殊不然。《江南春》体近填词,不止秦观之《小石调》,“野渡无人舟自横”本韦应物《西磻绝句》,準点窜一二字,改为一联,殆类生吞活剥,尤不为工。準诗自佳,此二句实非其佳处,未足据为定论也。乾隆五十一年十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此提要较文渊阁写本卷首提要“宋寇準撰”句后少“準字平仲,华州下邳人。太宗太平兴国中举进士,淳化五年参知政事。真宗朝累官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莱国公。乾兴初贬雷州司户,徙衡州司马,卒。仁宗时赠中书令,追谥忠愍”一段文字;“绰有晚唐之致”句后多“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比也”句,以及“尤为不工”句。又“《合璧事类前集》有《春恨》一首”句,“春恨”文渊阁本作“春憾”。与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刻本、六十年武英殿刻本《四库全书总目》相校,除“其诗乃含思凄惋”句两本《总目》“惋”字做“婉”,“终非凡艳所可比也”句两《总目》本无“也”字外,其他皆同。该文渊阁本提要已近乎定本。又文渊阁写本卷首提要时间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与馆臣办成文渊阁《四库全书》时间合,文渊阁本较之迟五年。两提要删改润色之迹可见。

两本内容也有不同。文渊阁原写本卷首有金紫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河阳州事上柱国范雍序,宣和五年十二月朔济南王次翁序,隆兴改元七月阙日长乐辛敦序,赠谥诰,孙抃奉敕撰旌忠碑文,可借以考知寇準事迹及该集版刻源流。文渊阁写本均无。校其正文,亦偶有异文,如《奉和御制奉祀述怀歌》“濂乡旧壤辟珍词”句,“词”字文渊阁本作“祠”,等。

2.《蠹斋铅刀编》

此残写本与文渊阁写本《蠹斋铅刀编》分册略不同,文渊阁写本卷六至卷

十二为一册,卷十三至卷十九为一册。两本相校,内容亦稍有异,如卷六《赠谢德瞻》一诗,文澜阁本在卷末,文渊阁本在《送王季裴往行在》之后。卷十二《寄宛陵陈丈》“更付功名笔砚中”,“砚”字文渊阁本作“研”。卷十三《寄从之时闻黄丈仲秉初亡》、《次韵题南仲诗卷兼柬廷珍》二诗,文渊阁本前者诗题下小字注“甲午”,后者注“乙未”,文澜阁本无。卷十五《贺太上皇后笺》文末文澜阁本有“臣以在外不获趋诣阙廷称贺”句,文澜阁本无。同卷《贺南郊表》“欢声遍于迓遐”句下文澜阁本有“中谢”二字,文渊阁本无;《谢赐历日表》“恭惟皇帝陛下”句前文澜阁本有“中谢”二字,文渊阁本无,等等。周氏此书,宋刻今已无传,元明未见刻本,清以来赖钞本流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该书底本为编修汪汝藻家藏本,此书提要出翁方纲草创,翁氏论其本云:“抄本。是影宋刻写,凡缺笔皆与宋刻同。”^①可知该书四库本价值颇高,此文澜本残本的版本价值亦可知。

3.《涧泉集》

韩淪此集《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流传甚罕。四库著录之本系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者。传世之本除四库本外,今仅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乾隆间翰林院写本,卷数与四库本同,红格,版式、行款亦同。从抄写笔迹看,系多人手抄,时有案语附于诗之后。卷端题“钦定四库全书”,“涧泉集卷一”,“韩淪撰”,版心题“钦定四库全书”和卷数。卷端钤有“诗龔居士存素堂图书印”、“诗龔藏书印”两方印章,曾经法式善收藏。其《陶庐杂录》载:“十年前,余正月游厂,于庙市书摊买宋明实录一大捆……又得宋元人各集,皆《永乐大典》中散篇采入四库书者。宋集三十二种,元集二十三种。”^②下录各集,中有“《涧泉集》二十卷,韩淪撰”,盖即指此国图藏本。

此残本两卷皆为古诗,卷五是五言,卷六是七言。以文渊阁写本《涧泉集》相校,两本皆五、六两卷为一册,分册同,所收篇目亦同。但有文字差异,如卷五《次韵景瑜》其二,文澜阁残本作:“昔年赋东游,言至蕙江汜。悬崖瀑布飞,赭霞千丈起。天然窗牖开,林壑邃尤美。偕隐夙有期,徇禄未能耳。”文渊阁本作:“从昔秋风起,骚人感兴同。霞收滕阁外,云落楚台中。寂寂无言说,纷纷有事功。漂流水南住,相望屋东西。”全然不同,未悉何以至此。而国图所藏翰林院写本与文澜阁本正同,唯“赭”字翰林院写本作“頰”,“窗牖”作“牖窗”。可证文澜阁本非误收。

4.《秋涧集》

该集元、明各有一刻,入清后多以抄本流传,《四库全书》本是该集一个重要版本。以此残本与文渊阁本相校,内容亦有异同,如卷五十八《大元故广威将军屯田万户聂公神道碑铭》,“陷东南城堞”句后,文渊阁本有“帝督战亲睹,

^①《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21页。

^②法式善:《陶庐杂录》,中华书局,1959年,第62页。

壮其勇，酌酒饮资，以纪其功”句，文澜阁残本无；“生擒者七十人”句后，文渊阁本有“赏楮币四千缗”句，文澜阁残本为“所谓用兵之道，不贵于多而贵于精，不贵于勇而贵于谋也”。《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文渊阁本“渊静以修己，和易而道行”句，文澜阁残本作“渊静以宏深，玄言而道行”，其中“以宏深”三字系后挖改，对比邻行，系以四字改为三字。卷六十《大元故河中府南北道船桥总管谢公墓碣铭》，文渊阁本“复树丰碑昭德，神道具表，新阡有光焉”句，“具表”文澜阁本为“例其”二字。类此者尚多。馆臣编纂四库，时有改窜，此可见其改易痕迹。又两本分册不同，文渊阁本卷五十七至五十九为一册，卷六十、六十一为一册。

5.《滋溪文稿》

以文渊阁写本《滋溪文稿》与此残本相校，两本分册不同，文渊阁本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为一册。校其内容，篇目一致，然各篇文字有异同，如卷二十二《默庵先生安君行状》，文渊阁本“赖有一二儒家传其遗业”句，文澜阁本无“有”字。《故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侍仪事赵文昭公行状》，文渊阁本“张氏顺天路达噜噶齐老孛之女”句，“达噜噶齐老孛之”文澜阁本作“达噜噶齐齐拉拜之”，此八字有明显挖改痕迹，字略小，比对邻行，知系改七字为八字，或被挖改者即“达噜噶齐老孛之”。《荣禄大夫枢密副使吴公行状》文渊阁本“扈从其主播汴滨，北归”句，“汴滨”文澜阁本作“汴，汴溃”；“帝视其貌，非人也”句，“非人”文澜阁本作“非常人”，文渊阁本显误。《资善大夫太医使韩公行状》文渊阁本“时帝春秋高，体常不平。典领方药，蒙赐貂裘”，文澜阁本“典领”前有“公”字，文渊阁本似夺此字。《元故徵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公仪观秀伟，美□髯”，“□”文渊阁本仅存“髯”字之上半部分，缺半字，文澜阁本作“鬚”。卷二十三《故嘉议大夫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使董某行状》，文渊阁本“左迁大都路总管，改陕西，行御史台事”句，文澜阁本“总管”后有“府判官”三字；“御史台事”文澜本作“御史台都事”。其他异处尚多。

6.《东皋录》

《东皋录》传世甚少，明末以来即主要以抄本流传，四库本以毛晋家藏抄本为底本。四库本无疑是该集非常重要的一个版本。以此文澜阁残写本与文渊阁写本相校，亦有不同。

文澜阁残写本卷首有提要云：

臣等谨案，《东皋录》三卷，明释妙声撰。妙声字九皋，吴县人。元末居景德寺，后居常熟慧日寺，又主平江北禅寺。洪武三年与释万金同被召，莅天下释教。所作诗文，缮写藏之山房。洪武十七年，其徒德璫始刊行之。妙声入明时年已六十馀，诗文多至正中所作，故顾嗣立《元诗选》亦录是集。然方外者流不婴爵禄，不能以受官与否为两朝之断限。既已谒帝金门，即属归诚新主，不能复以遗老称矣。今系之明，从其实也。妙声与袁桷、张翥、危素等俱相友善，故所作颇有士风。当元季扰攘之时，感事抒怀，往往激昂

可诵。杂文体裁清整,四六俚语亦具有南宋遗风,在缙流之内,虽未能语带烟霞,犹非气含蔬笋者也。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恭校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以此提要与文渊阁本卷首提要相较,“其徒德瓚始刊行之”句后文渊阁本多“《明史·艺文志》、《明僧宏秀集》皆作七卷。此本有‘汲古阁’印,盖毛晋家钞本。前有晋题识,亦称德瓚所刻。凡诗三卷,杂文四卷,而其书、杂文及诗仅共为三卷,盖传录时所合并也”一段。“然方外者流不婴爵禄”句文渊阁本“婴”作“樱”。“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恭校上”文渊阁本作“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浙江刻本、六十年武英殿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此书提要皆与文渊阁本同,唯“婴”字两本仍作“婴”。似文澜阁本卷首提要有意删节了馆臣的辨证语。然无此一段则无由知其版本及篇卷分合。此可见馆臣编四库时删改提要之迹。

正文文字也有异同,如《藏晖斋诗并序》,文渊阁本“允也其时”句,“也其”文澜阁本作“下补”二字,盖文澜阁本将底本之校勘之语误入正文。《王有恒听雨篷》文渊阁本“鱼龙出听天吴泣”,“吴”文澜写本作“河”,并在全诗末双行小字注:“‘河’旧本作‘吴’。”似文澜阁本较审慎。又《杂题画》诗十九首,文渊阁本多于各首之末小字注出所咏之画,失画名者即题一“阙”字,文澜阁本失画名者皆不题“阙”字。其他异处尚多。

7.《松泉集》

《松泉集》是《四库全书》别集类殿后之作。汪由敦字师茗,浙江钱塘人,雍正二年进士,累官吏部尚书,卒赠太子太师,谥文端。乾隆题句代序弁是集之首,可见其深得乾隆眷爱。是集在由敦卒后由其子编订成集,《清史列传》称:“乾隆五十二年,由敦子户部侍郎承需敬进呈其父诗文集,上题句当序。”^①此时北四阁《四库全书》早已办理完毕,南三阁也接近尾声,此书系后来补入者。乾隆四十九年(1784)赵怀玉杭州刊本《四库简明目录》即未载此书。

《松泉集》系补入四库者,似不应出现异文,但以此文澜阁残本和文渊阁本相校,仍发现不同文字。如卷内句末语气词“耶”字,文澜阁本多作“邪”。又如卷十六《跋王永斋先生遗迹》文渊阁本“尝出诗集命由敦编校,甫交业”句,文澜阁本“交”作“卒”,似“卒”为长。《跋张晴岚家藏画卷》“又如东篱采菊,悠然忘言”句,“悠然”文澜阁本作“悠悠然”。卷十七《跋手临董文敏仿唐人十二月相闻书》“悲骨肉之聚散”句,“肉”字文澜阁本作“月”。凡此种均不可能是删改违碍所致,也不可能是版本歧异,而是抄手笔误。此可见馆臣办理四库之精粗。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①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463页。